

云冈第五窟刍议

杭 侃

内容摘要：云冈第五窟现状较为复杂，既有能够连接昙曜五窟的早期因素，也有服饰改制之后的晚期因素。笔者从石窟开凿施工的角度，参考相关工程遗迹，认为第五窟开凿时间较早，与献文帝有关，后因政治影响停工，主要造像完成的时间已经是孝文帝迁都洛阳之前。

关键词：云冈石窟 新旧样式 开凿工程

Discussion on Cave 5 at Yungang Grottoes

Hang Kan

Abstract: The phenomenon of Yungang Cave 5 which contains early styles related to Tan Yao Five Caves and late styles after clothing reform is very complicated. Based on the investigation of construction relics, this paper tries to reconsider Cave 5 in the view of grotto excavation project. It is indicated that the project of Cave 5 might start earlier in the period of Emperor Xian Wen, and then shutdown under the influence of politics. The final project of completing the main statues restarted before Emperor Xiao Wen's moving capital to Luoyang.

Key words: Yungang Grottoes, early and late styles, construction project

云冈石窟分为前、中、后三期，前期是如昙曜五窟的大佛窟，中期是像第7、8窟或9、10窟那样模仿木构建筑的佛殿窟，后期是北魏迁都洛阳后开凿的小规模石窟。云冈第五、第六窟通常被认为是云冈第二期开凿的一组双窟。日本学者所著《云冈石窟——公元五世纪中国北部佛教石窟寺院的考古学调查报告》在描述第五窟内容的时候开宗明义地说“第五洞和第六洞为双窟”^①。

作者：杭侃，北京市，100871，北京大学中国考古学研究中心。

① 《云冈石窟——公元五世纪中国北部佛教石窟寺院的考古学调查报告（第二卷）》，第五窟，京都大学人文科学研究所。

但是,第五窟与第六窟在洞窟形制、造像题材、造像风格等方面均存在很大的差异。在洞窟形制方面,第五窟为平面马蹄形的穹隆顶窟,主尊占据了窟内大部分面积,而第六窟为中心塔柱窟(图1);在造像题材方面,第五窟的主要造像除了正壁主尊,还有东西两壁的两身立佛,以及从属于正壁主尊、位于主尊大背光之下的两身菩萨像(图2);而第六窟中心塔柱下层四面大龕中,分别雕坐佛、倚坐佛、释迦多宝对坐和交脚弥勒。中心塔柱四面大龕的两侧和窟内东、南、西壁,雕刻三十多个连续的佛传故事。面对中心塔柱的南壁窟口上方雕维摩、释迦和文殊。在造像风格上,第六窟全部大型佛像改变了过去的服装,都雕成了褒衣博带式;第五窟则在窟门与明窗两侧等处依旧雕刻有袒右式袈裟的龕像。

对比同是双窟的第一、第二窟,第七、第八窟和第九、第十窟,这三组洞窟的平面形制、造像题材、造像风格都比较接近。第五、第六窟如果作为双窟看待,则与以上三组洞窟存在着很大的差异。对此,《云冈石窟——公元五世纪中国北部佛教石窟寺院的考古学调查报告》的解释是:

“第五洞为以大佛为中心的石窟,它和西邻的以方柱为中心的第六洞成为一对。其外壁共有一组塔形,因此这个情况非常明确。而且,其大小、样式完全一致,明显是一对制作于同时代的作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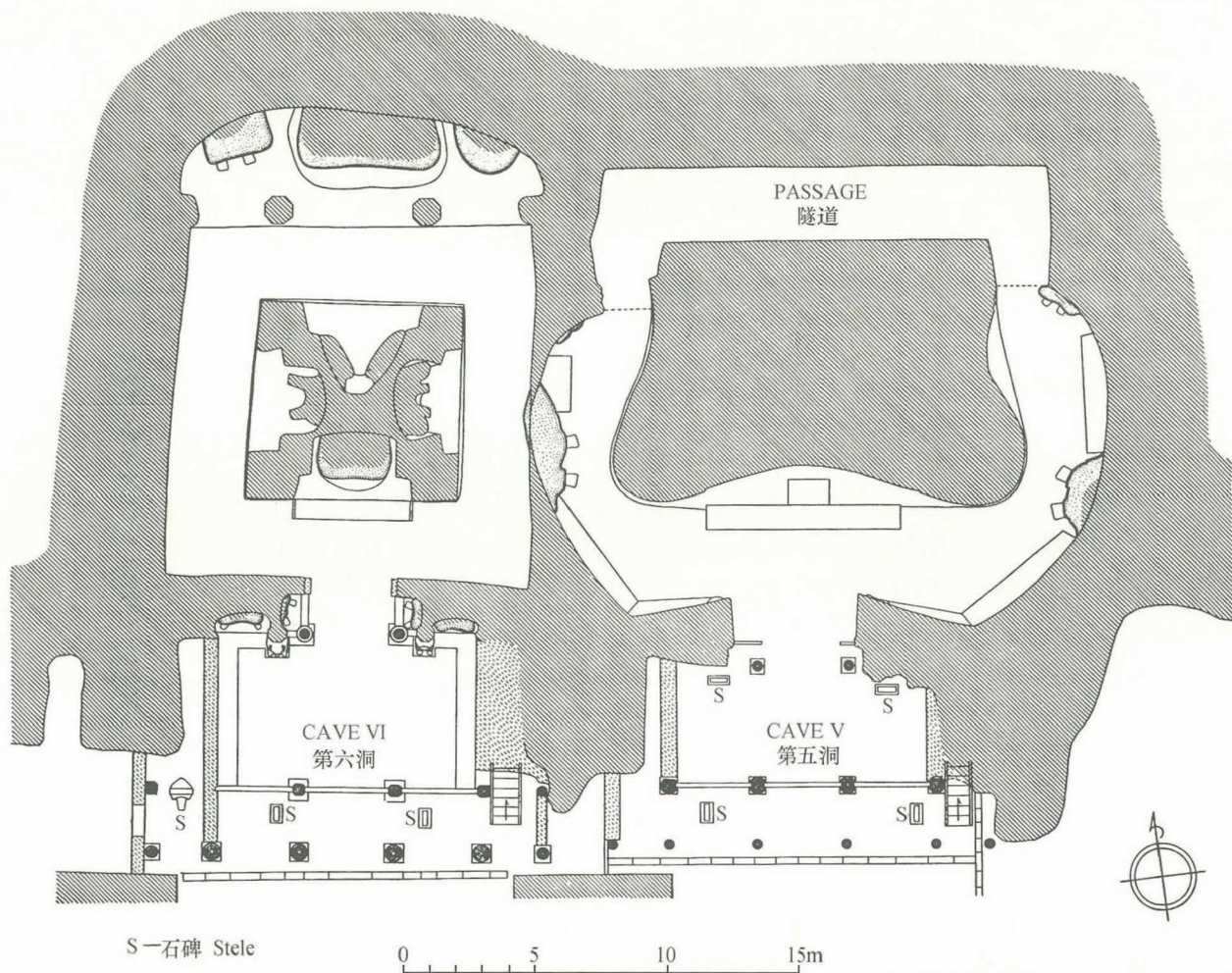


图1 第五窟与第六窟平面图

(采自《云冈石窟——公元五世纪中国北部佛教石窟寺院的考古学调查报告》第二册)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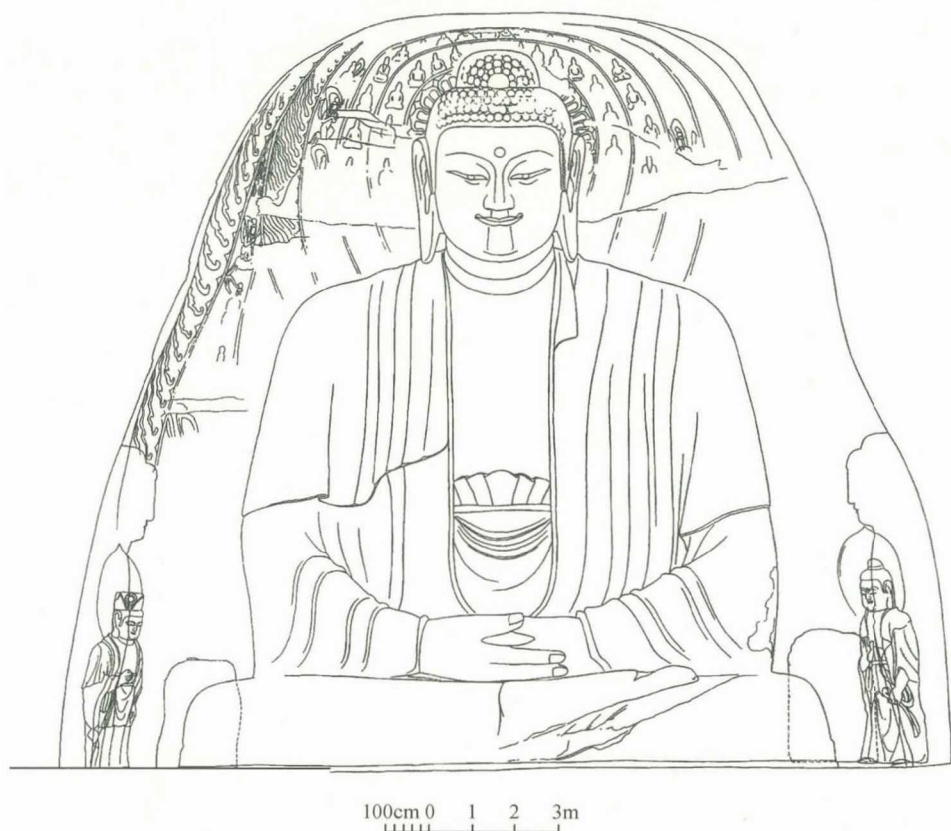


图2 第五窟正壁正视图

（采自《云冈石窟——公元五世纪中国北部佛教石窟寺院的考古学调查报告》第二册）

品。一般来讲，早期佛教的崇拜对象不是佛像而是佛塔。后来，佛像代替佛塔成为普遍化，然而有不少塔庙窟，这可能是因为这个时代刚好处于变革期，或者可能是石窟长期保持着以塔为中心的传统。在这里，与法隆寺把安置尊像的金堂为左、作为塔庙的五重塔为右的做法一样，以尊像窟第五洞为左、塔庙窟第六洞为右。这是在云冈诸多双窟中罕见的组合，也是唯一的范例。”

“不管第七、第八洞的双窟，第九、第十洞双窟，还是第一、第二洞双窟，都是以同样形制的石窟为一组。只有第五、第六洞是由尊像窟和塔庙窟的组合。所以，其结构也有近于梯形的圆形和方形的区别，顶部也有穹窿顶形式和平顶的区别。”

将第五、第六窟作为一组双窟看待之后，《云冈石窟——公元五世纪中国北部佛教石窟寺院的考古学调查报告》的作者认为“根据以上情况，再看大规模的、有计划并且迅速的开窟活动，可以判断在国家级项目中，特别集中朝野力量去营造第五、第六洞。那么，最有可能的推论为，该石窟在孝文帝初年（476年）为了纪念死于非命的献文帝（466～470年）而造。因此，其完工时间为太和七年（483年）的孝文帝石窟寺行幸的看法，可以说完全符合逻辑”^①。也就是说，《云冈石窟——公元五世纪中国北部佛教石窟寺院的考古学调查报告》的作者认为第五、第六窟是一组

① 前引书，《云冈石窟——公元五世纪中国北部佛教石窟寺院的考古学调查报告（第二卷）》，第五窟。

双窟,开凿于太和时期,第五窟完成时间为太和七年(483年),开凿目的是孝文帝为了纪念自己的生身父亲献文帝。在这里,作者将第五窟与献文帝联系了起来。

宿白先生则把第五窟的年代定在了迁都洛阳之前。在《云冈石窟分期试论》里,宿白先生论述第五窟时认为:

“5、6、7、8、9、10三组双窟,东西毗邻;三组双窟窟前外壁左右两侧又都雕凿高塔,这些都是说明它们时间接近的最好迹象。5、6、7、8,两组采用同一的双塔一碑的窟前设计(两组石窟的中间隔壁的前端,都雕出下具龟趺的丰碑),又都出现释迦多宝对坐和维摩、文殊的形象,这种情况,正和孝文帝时,北魏开始重视义行僧人,注意宣讲《法华》《维摩》两经的历史背景相符合,这些似乎也都给5、6、7、8两组双窟是孝文开凿的推测,增添了论据。”

“6窟的全部大型佛像改变了过去的服装,都雕成了“褒衣博带”式。佛像褒衣博带是与孝文帝太和十年至十九年(486~495年)的服制改变相呼应的。所以推测6窟竣工之时,已去太和十八年孝文迁洛不远。至于5窟壁面布满了没有统一布局、时间又不相同的小龕,更说明了它并未按原计划完工,这种情况当然也与孝文南迁有关。因此,5、6窟这一组双窟的时间,约在孝文帝都平城的后期。”

宿白先生将第五窟完成的时间定在孝文迁都洛阳之前,显然更为合理^①。但是,大型石窟的完成时间未必就是开凿时间。《云冈石窟——公元五世纪中国北部佛教石窟寺院的考古学调查报告》的作者早就注意到了第五窟中的一些早期迹象:

“第五洞的特征为是以坐佛大像为主尊。云冈石窟中,拥有坐佛大像的石窟有第十九洞和第二十洞。都是昙曜五窟中的石窟。现在,第十洞的主尊为坐佛,但原来应该是交脚菩萨像。现在,对比这三个洞窟(第五,第十九,第二十洞),坐像双膝外撇,占据窟内大部分空间。”

《云冈石窟——公元五世纪中国北部佛教石窟寺院的考古学调查报告》的作者注意到的第五窟中的早期因素还有主尊背光中的火焰纹:

“主尊的大火焰光占满了北壁,一直到顶部中央。背光下端有小型胁侍菩萨立像,其内侧有通往后面的隧道开口。菩萨像都是康熙时期泥塑,只有右胁侍菩萨的宝珠形头光和三角饰宝冠保留了原来的风格。头光外缘为唐草纹,里层是莲花纹,这种形式比较罕见。”

“主尊背光已严重破损,其中西部外缘的双层火焰保存较好,非常壮大。外层火焰带本为身光的外缘,里层火焰为头光的外缘。都与第二十洞大佛的火焰相似。头光火焰里先有供养飞天列像,其次有坐佛列像,再有坐佛列像,最中间是莲花纹。与第二十洞大佛背光相比,其带圈较窄,数量较多。举身光里有供养飞天列像,肩部有火焰。”

前面已经论述,昙曜五窟的基本样式为主尊占据窟内大部分面积、穹隆顶、马蹄形平面,主要造像以三世佛为主,在云冈第二期洞窟中,这些特点只有第五窟与之相接。在火焰纹装饰方面,第二期的洞窟中也只有第五窟主尊大背光外侧的火焰纹与第二十窟外侧的火焰纹式样相同。

2017年,日本学者冈村秀典《云冈石窟的考古学》中,对云冈主要洞窟的开凿次第进行了新

^① 宿白:《云冈石窟分期试论》,《中国石窟寺研究》,北京:文物出版社,1996年。

的排列。他在学界意见基本一致的将云冈石窟分为三期的基础上,又将每一期分为三段^①,进一步将第五窟的年代定在第一期的第三段,其主要依据之一,就是根据火焰纹的型式变化。在“背光纹样的编年”中,作者提出:

“除了以石窟形状、造像样式作为细分前期的标准之外,主要尊像的背光纹样也很重要。笔者(1994年)注意到昙曜五窟尊像背光的火焰纹,将其分为三类,I类火焰每支分开,根部有较宽的浪尖似的瘤节,II类每束火焰之间有独立的火焰束,III类在根部呈岩块状,从每块根部伸出三支火焰,下部有漩涡状的突起。尽管这虽不是以编年为目的的分类,但可将I类根据雕刻细致程度分为IA和IB两类,II类根据火焰尾部的斜率和火焰中间的细线刻画,细分为IIA和IIB类。这样将其IA类对应前1期、IIA类对应前1~前2期,IB、IIB、III类对应前3期进行编年。另外,I类和II类可见于前例,即甘肃炳灵寺有西秦·建弘元年(420年)铭文的第169窟,可以认为有直接的影响。”

综上所述,第五窟现状呈现的面貌是比较复杂的,既有能够连接昙曜五窟的早期因素,也有服饰改制之后的后期因素。学者们对这些看似矛盾的现象进行了不同的解释。笔者认为,第五窟开凿时间早,中间有停工,主要造像完成的时间已经是迁都洛阳之前,而且,第五窟确与献文帝有关。

2009年,笔者获得教育部人文社会科学研究重大项目的资助,开始组织课题组成员开展“云冈石窟补凿遗迹的考古调查与研究”(项目编号2009JJD780001),这项研究关注的重点是通过云冈石窟中未完成的窟龕、洞窟的打破关系以及不同的补凿遗迹,来探讨云冈石窟的开凿过程,并进而讨论相关的历史问题。在随后开展的工作中,获得了一批有深入研究价值的信息。彭明浩在此基础上完成了博士学位论文,并出版了《云冈石窟的营造工程》^②。在“五华洞”区(9~13窟)进行窟檐建筑的保护工程中,发现编号13-29、13-30两小型洞窟提供了开凿过程中的不同阶段的工序。

13-29窟位于13窟明窗东侧1.2米,距地高8.6米,在地表看原以为是一个大龕,实际上是一个带有窟门的小型洞窟(图3),只是窟口几乎完全坍塌,只存西侧上部一角。

窟内平面近方形,平顶,东西宽1.9米,南北深1.6米,高1.8米,三壁造像,正壁一尊坐佛,两侧壁各并立一佛(近窟口)一菩萨(近正壁)。其中正壁主尊仅凿出坯形,通高1.6米。其头部为近椭圆形的石坯,未做任何雕饰;身部凿出肩形和手势,座部大略凿出了佛腿部与基座的轮廓(图4)。

侧壁靠近主尊的两身菩萨完成度较正壁高,两菩萨通高约1.45米。冠部已凿出轮廓。头部区分了额发与脸部,额发中分,脸部呈椭圆形,双耳垂肩。上身已凿出左右手的手势,左手举于胸前,持拂尘,右手下垂,颈部饰桃尖形项圈,从肩上搭下交于胸前的披帛均已雕凿出轮廓。

侧壁靠近窟门的两尊立佛已完成,两立佛通高约1.65米。两佛整体造型相同,均高肉髻,面部清秀,长颈,着褒衣博带式袈裟,内着僧祇支,胸前系带,右手施无畏印(东壁残),左手下垂,衣角与下裙外摆。但细节却有差异:东壁佛没有表现衣纹,而西壁佛却雕刻有细密的衣褶;东壁佛左手下垂掌心向内执衣角,而西壁佛施与愿印。

① 冈村秀典:《云冈石窟的考古学》,临川书店,2017年。

② 彭明浩:《云冈石窟的营造工程》,北京:文物出版社,2017年。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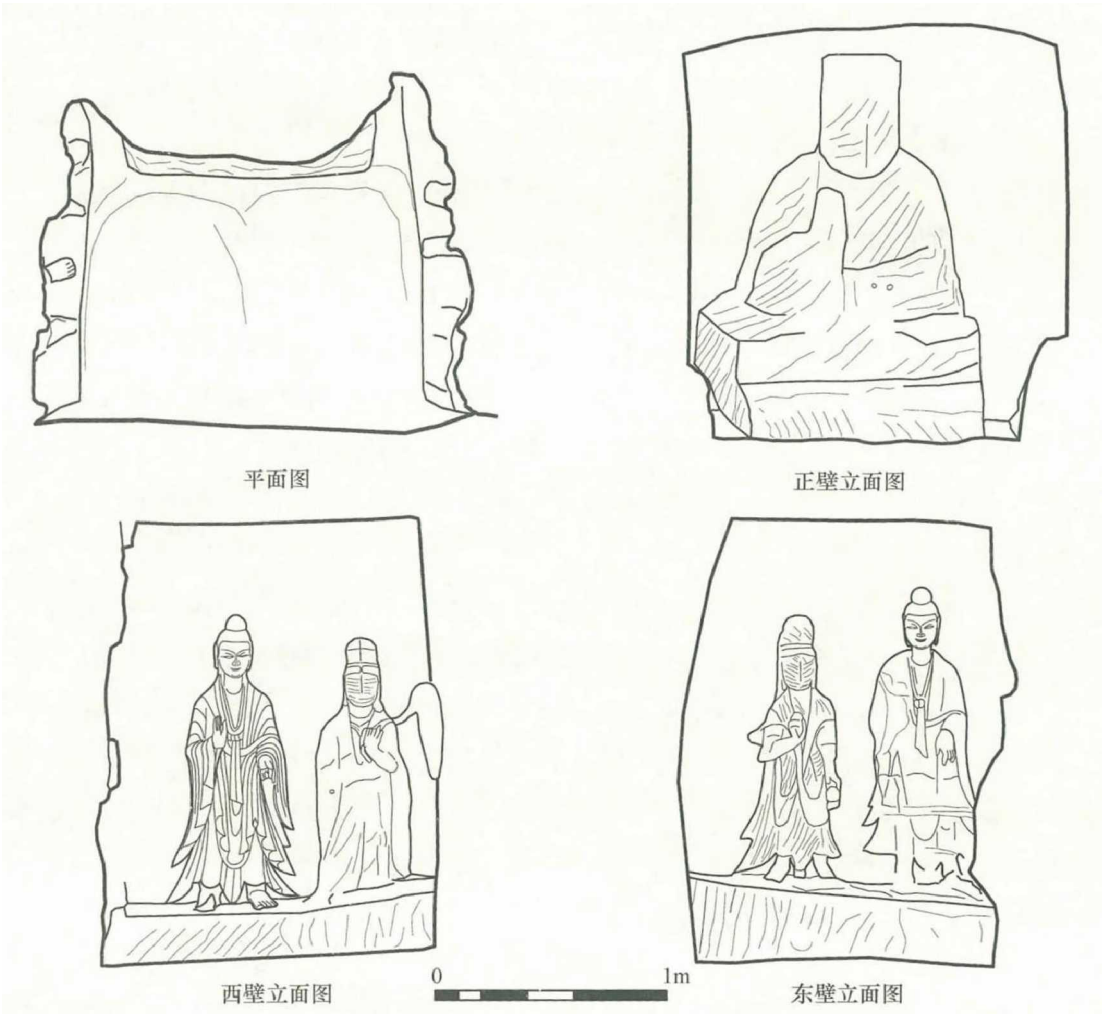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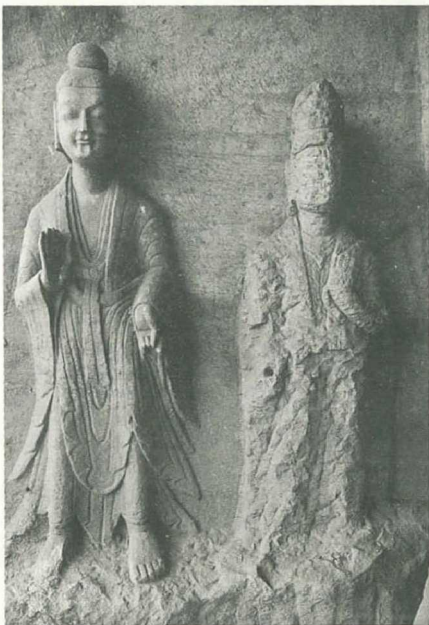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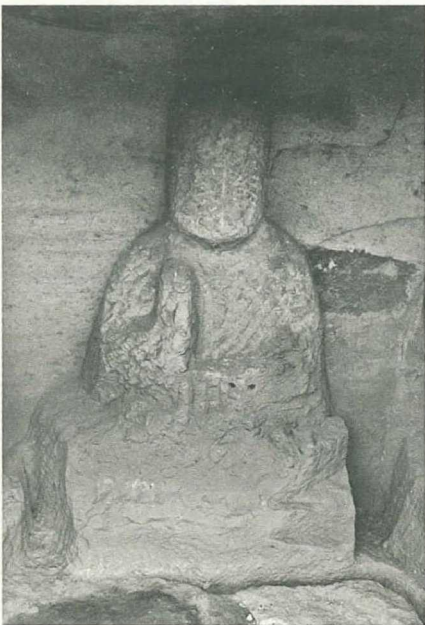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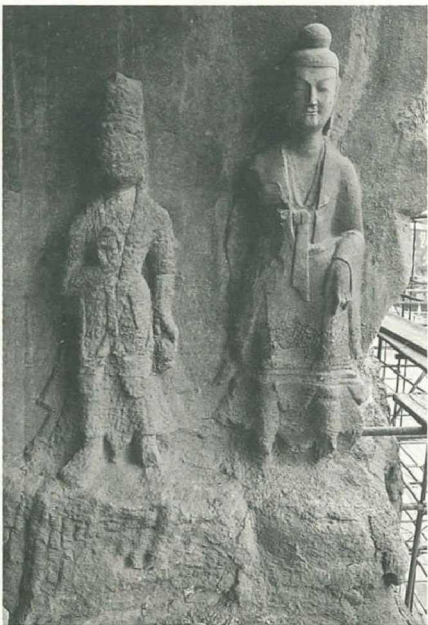
图3 第13-29窟平、立面测绘图



西壁



正壁



东壁

图4 各壁面现状

13 窟明窗西侧的 13-30 窟距地高度 9.7 米，窟门尚存。窟平面为不规则的横长方形，窟底东西最宽处 1.8 米，南北最深处 1.2 米。穹隆顶，窟高 2.05 米（图 5）。



图 5 13-30 窟平、立面测绘图

正壁设圆拱尖顶龕，宽 1.15 米，高 1.2 米，深 80 厘米，龕内雕二佛对坐，两佛均未凿完，但头、身、腿三部分的要素已具备，头部已凿出肉髻和五官的雏形，但尚未细致加工；身部已凿出双领下垂的衣纹走势，还能看出右领衣纹下垂后在身前搭附于左手前臂。二佛像均右手施无畏印、左手施与愿印。二佛之间的龕内壁正中有明显的分界线，东侧龕壁内密布一寸二釐的粗凿痕，西侧龕壁则经过打磨，没有凿痕。以此分界线可分窟为东西两部，两部完成度不同（图 6）。

西侧龕柱柱上兽头已雕完，东侧兽头仅凿出轮廓。龕楣内七坐佛，也以中线分东西两部分，西部完成，东部仅雕出坐佛的整体轮廓。龕两侧各立一胁侍菩萨，从脚至头光尖通高 90 厘米，西侧菩萨除脸部外均完成；东侧菩萨与西侧姿态、服饰基本对称，但只凿出坯体，未凿出头光，身体各部分只具轮廓，衣纹也没有细部，满布细凿痕。两菩萨外侧还各有一站立的菩萨，他们分别朝向东西壁坐佛。

西壁方坛上结跏趺坐佛，通高 1.3 米。佛头部虽毁坏，但残存的颈部尚存粗凿痕，可推测头部未完成。佛像头部以下，衣纹已经完成，东壁方坛上的结跏趺坐佛完成度远不如西壁。佛通高

1.25 米,只凿出了大体形态和主要衣纹走向,可见其双领下垂,左手施与愿印,右手施无畏印,脸部凿出五官轮廓,佛身上满布凿痕。由 13-30 窟的造像和开凿痕迹可看出,洞窟有总体规划,在开窟过程中分为东西两区分别施工,布局和像设大体对称,但进度不同,各造像细节也可能因工匠不同而略有差别(图 7)。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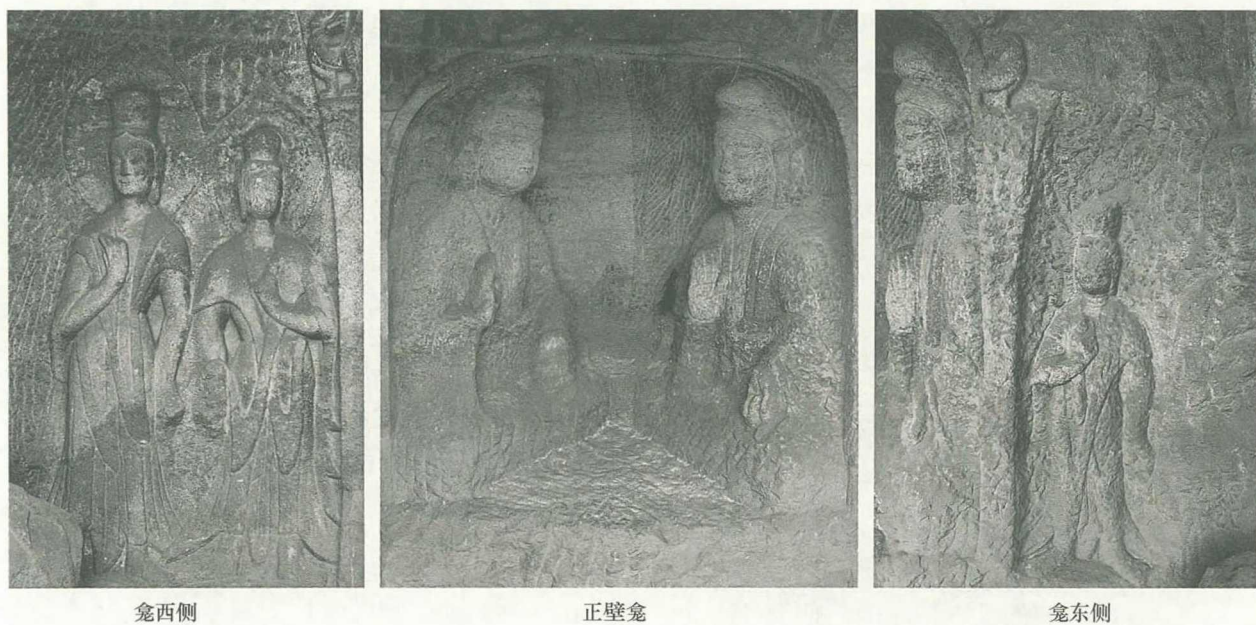


图 6 13-30 窟正壁现状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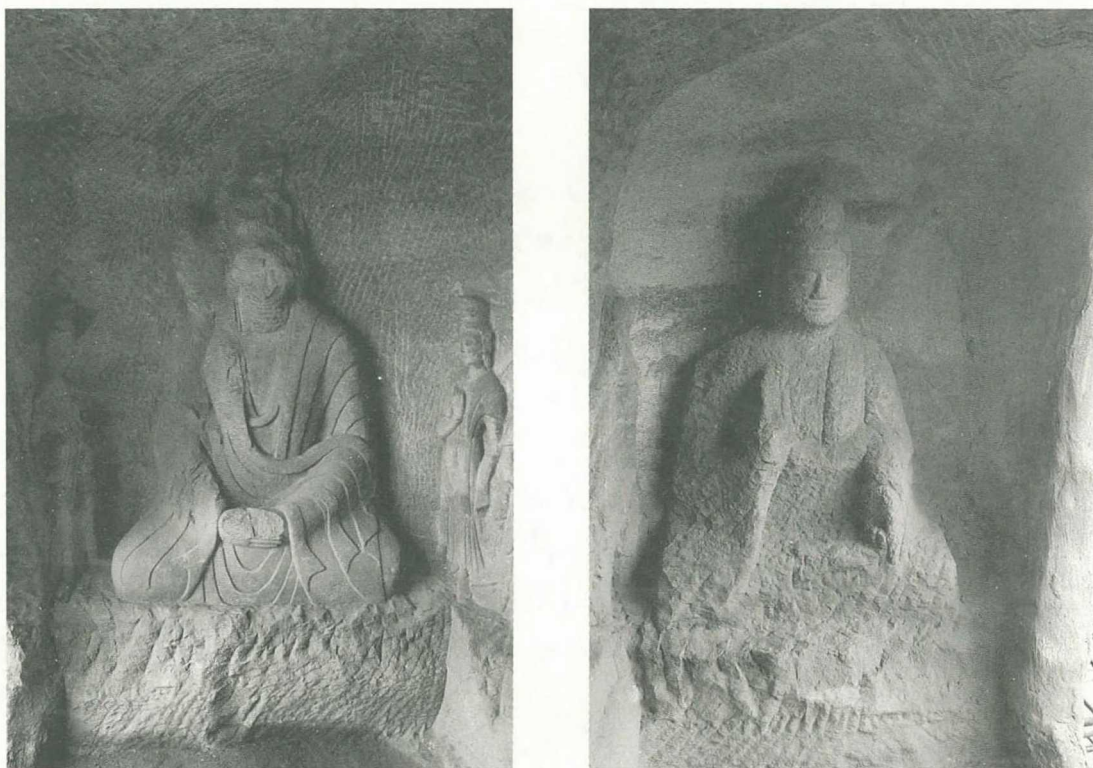


图 7 13-30 窟东西壁现状对比(左为西壁,右为东壁)

云冈小型洞窟的开凿始于二期后段，洞窟平面一般为方形，宽、深不过2米，许多洞窟未全部完工，从这些完成程度不一的洞窟可以大体了解小型洞窟的开凿过程，可以看出这些洞窟一般都是先完成辅助造像，如胁侍菩萨、弟子及龕楣上的坐佛、飞天、供养人等装饰题材，其后才是主像。具体到单尊造像，特别是主尊造像，往往最后加工的是头部和手部。如13-30西壁主像已基本完成，独颈部以上还留有凿痕痕迹；又如5-36东壁小窟正壁佛像衣纹已打磨，唯独手部和头部没有加工（图8）；再如40-4窟，窟内仅主尊和胁侍头部未完成。头部和手部直接表现造像姿态神情，最难雕刻，也容易出现工程问题，因此多留在最后处理^①。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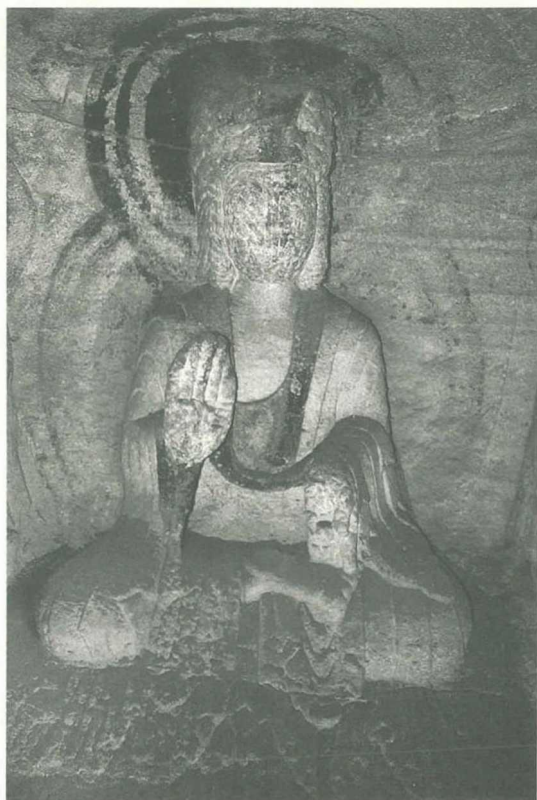


图8 第5-36窟东壁小窟正壁像

以上是从未完成的云冈小型洞窟所了解到的一些石窟开凿工序方面的信息。如果大型石窟也基本遵守这样的工序，则我们认为云冈第五窟所表现出来的既有早期因素，又有晚期因素的原因是：第五窟在献文帝时期开始开凿，已经完成了洞窟窟内主体空间的采石工程和几身大像的胚体，以及主尊背光等装饰带的雕刻。但是，由于工程浩大，工期不可能在短期之内完工。工程在进行过程之中，遇到献文帝与冯太后两人为主的政治集团的激烈斗争而不得已停工，至于第五窟的继续雕凿，则要等到冯太后去世，孝文帝真正掌握实权之后，为了纪念自己的父亲，才将第五窟未竟的工程加以继续，因此，第五窟主尊及两侧立佛等又表现出第二期晚段的风格。

献文帝即位年仅十一岁，文成帝冯皇后被尊为太后，临朝辅政。献文时，佛事营建依然兴盛，《大金西京武州山重修大石窟寺碑》记献文帝“天安元年（466年），革新造石窟寺”^②，其中“革新”一词，应当是表示这个时候云冈的石窟开凿进入了一个新的阶段，这种革新，既包括着选择新的地方开凿石窟，也意味着新的样式的出现。紧接着，《魏书·显祖纪》记载献文帝于天安二年（467年）巡幸石窟寺“秋八月，丁酉，行幸武州山石窟寺。戊申，皇子宏生，大赦，改年”。

当代史学界对于献文帝与冯太后两个政治集团之间的斗争已经多有论述，此不赘述。

根据《魏书·显祖纪》的记载，献文帝兴光元年（454年）秋七月，生于阴山之北。太安二年（456年）二月，立为皇太子。和平六年（天安元年，466年）继皇帝位，皇兴五年（471年）

① 前引书，《云冈石窟的营造工程》。

② 宿白：《〈大金西京武州山重修大石窟寺碑〉校注——新发现的大同云冈石窟寺历史材料的初步整理》，《中国石窟寺研究》，北京：文物出版社，1996年。

禅位。承明元年(476年)二十三岁,崩于永安殿,上尊谥曰献文皇帝,庙号显祖,葬云中金陵。《魏书·天象志》对当时两个政治集团之间的激烈争斗直言不讳,并与天象联系在一起。《魏书·天象志》多处涉及冯太后专断:皇兴五年,“上迫於太后,传位太子,是为孝文帝”;“是时冯太后宣淫于朝,昵近小人而附益之,所费以巨万亿计,天子徒尸位而已”;“是时,献文不悟,至六月暴崩,实有酖毒之祸焉”;“太和元年五月庚子,太白犯荧惑,在张,南国之次也。占曰‘其国兵丧并兴,有军大战,人主死’。壬申,水、土合于翼,皆入太微,主令不行之象也。占曰‘女主持政,大夫执纲,国且内乱,群臣相杀’;是时,冯太后将危少主者数矣,帝春秋方富,而承事孝敬,动无违礼,故竟得无咎……是时太后淫乱,而幽后侄娣,又将薄德。天若言曰:是无《周南》之风,不足训也,故月、太白骤于之。”

冯太后死于太和十四年(490年),因此,若如《云冈石窟——公元五世纪中国北部佛教石窟寺院的考古学调查报告》作者所言,太和七年第五、第六窟已经完成,那么,等于是冯太后掌权期间,就已经为献文帝平反,这在文献中是没有证据的。

第五窟的续凿工程应当开始于冯太后去世之后,是孝文帝为了纪念自己的亲生父亲而进行的。《魏书·皇后列传》中记述冯太后有才干,处事果决:

“显祖即位,尊为皇太后。丞相乙浑谋逆,显祖年十二,居于谅暗,太后密定大策,诛浑,遂临朝听政。及高祖生,太后躬亲抚养。是后罢令,不听政事。太后行不正,内宠李弈,显祖因事诛之,太后不得意。显祖暴崩,时言太后为之也。”

冯太后掌权之后,锐意改革,史家多称孝文帝改革,实际上在冯太后生前,主要是冯太后实行改革,这在《魏书·皇后列传》中记载得很清楚:

“自太后临朝专政,高祖雅性孝谨,不欲参决,事无巨细,一禀于太后。太后多智略,猜忍,能行大事,生杀赏罚,决之俄顷,多有不关高祖者。是以威福兼作,震动内外。”

冯太后对于孝文帝的感情是复杂的。《魏书·高祖纪》记载冯太后对孝文帝管教甚严:

“帝幼有至性,年四岁,显祖曾患痢,帝亲自吮脓。五岁受禅,悲泣不能自胜。显祖问帝,帝曰:‘代亲之感,内切于心。’显祖甚叹异之。文明太后以帝聪圣,后或不利于冯氏,将谋废帝。乃于寒月,单衣闭室,绝食三朝……宦者先有潜帝于太后,太后大怒,杖帝数十。帝默然而受,不自申明。”

以至于在冯太后生前,孝文帝对自己的身世都不清楚,《魏书·皇后列传》记冯太后“又自以过失,惧人议己,小有疑忌,便见诛戮。迄后之崩,高祖不知所生”。

在这样的情况下,孝文帝在冯太后生前不可能对献文帝表示大规模的追念,而在冯太后死后,继续献文帝在云冈开端的大型洞窟开凿过程,又在情理之中。

第五窟之所以在中区东段另行开凿大型洞窟,从工程的角度考虑,可能还是因为昙曜五窟工程出现的问题,造成20窟窟壁的坍塌,被迫另择新址^①。第五窟在洞窟形制、造像题材和背光中的火焰纹等装饰纹样方面上承昙曜五窟是很明显的,而“革新”的主要内容,从现存遗迹看,主

① 拙文:《云冈第20窟西壁坍塌的时间与昙曜五窟最初的布局设计》,《文物》1994年第10期,第56~63页。

要表现在洞窟具有带双塔的前庭，以及主尊身后的隧道两个方面。对于主尊身后的隧道，《云冈石窟——公元五世纪中国北部佛教石窟寺院的考古学调查报告》认为：

“第五洞与第十九、二十洞相比较，还是第五洞最宽敞。第十九洞没有胁侍佛也没有胁侍菩萨，洞内空间只属于坐佛。第二十洞虽然有胁侍佛和胁侍菩萨，但感觉都被塞在狭窄的空间内。开凿第五洞的时候，可能多少有了对以往石窟形式的认识。而且，在背后做为了绕道礼拜的隧道。这与第九、十洞一致，也与巴米扬和克孜尔石窟相同。第十九洞和第二十洞没有做隧道，其原因不详。可能他们不知道这种结构，也有可能不需要这种礼拜活动，或者完全没有这种追求。不管怎么样，他们集中精力制造主尊大佛。开凿第五洞的时候，制订计划上稍微熟练，除了大佛以外还考虑隧道，除周壁外考虑明窗和门口的造型，这些可能受到西邻的第七、八洞，第九、十洞的影响，更是因为第五洞的开凿时间晚于其他洞窟。”

至于带有双塔的前庭，属于献文革新之作。这种做法与第一期洞窟不同，完全改变了洞窟的外观。为什么这样做的原因还有待探讨（是否与第二十窟西壁和前壁坍塌之后，对于立面的修正处理有关？）由于第六窟也具有前庭与双塔，这是过去学者多将第五、第六窟作为一组双窟的重要依据之一，但是，除了第五、第六窟在前述洞窟形制、造像题材、造像风格等方面的差异之外，第六窟的西侧之塔与第五窟的双塔并不在一个斩山面上，更为明显的是，第六窟与第五窟相连的壁面上，在施工中出现了重大的失误，在现在最薄的地方已经穿透了一个小洞，第六窟显然是夹进了第五窟与第七窟之间，故第六窟与第五窟并非同时设计，两者之间存在比较大的差异也就可以得到解释了。

附记：本文写作得到了筱原典生和陈豪的帮助。其中《云冈石窟——公元五世纪中国北部佛教石窟寺院的考古学调查报告》关于第五洞的译文采用筱原典生的译文；冈村秀典《云冈石窟的考古学》中的相关内容采用陈豪的译文，特此致谢。